

F325.753

<1>

· 内部材料 ·
· 注意保存 ·

785443

江 村 信 息

江 村 社 会 调 查 文 集 (二)

- (81) 农村调查
- (82) 农村调查
- (83) 农村调查
- (84) 农村调查
- (85) 农村调查
- (86) 农村调查
- (87) 农村调查
- (88) 农村调查
- (89) 农村调查
- (90) 农村调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江 苏 省 社 会 学 会 编 印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目 录

江村的人口变化 沈美宝、林友苏 (1)

· 医学社会学调查报告选辑 ·

编者的话 (18)

江村医疗保健情况的调查 李启民 唐银娣 (19)

江村青少年生长发育调查 许泽兰 吉华平 (22)

江村学生视力状况调查 马德胜 (34)

江村少女青春发育与心理调查研究 周达生 (42)

江村老年病及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 刘训正 (47)

从江村农民的死因看我国农村一些社会医学问题 周达生 (53)



江村的人口变化

沈关宝 林友苏

江村是太湖流域一个普通的自然村落，它的原名叫做开弦弓，地处江苏省吴江县境内。一九三六年夏季，费孝通教授首次来到这里作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江村经济》^{〔1〕}一书。作者在书中不仅以真切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丝绸之乡的农家生活，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些人口统计数字。一九五六年五月，澳大利亚学者W·R·格迪斯慕名前往该村访问了三天^{〔2〕}。他在他的访问专刊中也对江村人口作了部分的统计分析。一九八二年元旦前后，费孝通教授回访江村，亲自指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江村调查组，在开弦弓村作追踪式调查，历时三十四天。在此期间，我们在组内其他同志的协助以及当地干部群众的配合下，对江村的人口变化进行了专题研究。

开弦弓是个名符其实的水乡。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水荡，从水荡伸展出两条形如开弓之箭的河道将全村划分为三大块^{〔3〕}。就在这总面积不足二平方公里的水乡舞台上，近半个世纪以来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悲喜剧。这些社会剧目首尾相连，构成了江村巨变的历史。我们企图追记这些剧目，写出这部历史。然而从哪儿落笔为好呢？费孝通教授的话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他说：社会结构只不过是纸面上的空架子，而那些在这结构里生活的人才在这社会结构的实体。一个个人把结构充实了才成一个生活的单位，一个社区^{〔4〕}。于是，我们就从开弦弓村历史剧的演员们，即世代绵续、代代有别的开弦弓人口写起。

一、人口变化的概况

全组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年底以十六个项目普查了开弦弓村的人口。经过复核得到全村人口总数和分性别的人数有如下表。

表 1. 开弦弓村人口总数与性别变化

年 份	人 口 总 数	男	女	性 别 比 率
1935	1,458 ^{〔5〕}	771	684	113
1956	1,440	804	636	126
1981	1,761	950	811	117

〔1〕《江村经济》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中译名。

〔2〕据W·R·Geddes在访问专刊《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中称，他在1956年5月12日下午到达开弦弓村，于5月16日晨离开这个村子。

〔3〕在这三部份中有两部份归属开弦弓大队，另一部份则与一个名叫荷花湾的村子合在一起，称为荷花湾大队。为了能与历史资料作有效比较，下文中的全部数据都排除了荷花湾村的那一部分。

〔4〕见费孝通《生育制度》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刊。

〔5〕1935年的人口统计中有三人的性别、年龄不详。



22421761

徐州师院图书馆

由表一可见,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八一年的四十六年间,开弦弓村总人数由1458人增至1761人,净增303人,增长率为20.8%。该村人口增长速率之低是令人惊异的。这里先不说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人口下降。就是从一九五六年以后的二十五年内,全村人数也只是增加了321人,增长率为22%。这与全国同期人口增长率(约70%)比较也是相当低的。在男女性别比率上,这三个年份的数据都显示出男性人口大于女性人口。

为了详细考察这段时期全村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的变化,我们以五岁为一个年龄组距列出表2。

表 2. 1935年、1956年、1981年开弦弓村人口性别、年龄分布

年龄组	总 数			1935			1956			1981		
	1935	1956	1981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1+	19	36	76	4	15	0.267	13	23	0.565	33	43	0.767
66—70	29	22	53	10	19	0.526	9	13	0.692	28	25	1.12
61—65	46	35	66	14	32	0.438	17	18	0.944	29	37	0.784
56—60	69	68	87	30	39	0.769	31	37	0.838	44	43	1.023
51—55	78	72	107	40	38	1.053	42	30	1.4	58	49	1.184
46—50	55	84	126	26	29	0.897	44	40	1.1	78	48	1.625
41—45	83	83	101	45	38	1.184	47	36	1.306	63	38	1.658
36—40	124	97	94	69	55	1.255	54	43	1.256	58	36	1.611
31—35	109	106	162	64	45	1.422	56	50	1.12	88	74	1.189
26—30	136	109	202	75	61	1.23	52	57	0.912	100	102	0.98
21—25	115	164	110	63	52	1.212	90	74	1.216	61	49	1.245
16—20	122	126	142	68	54	1.257	68	58	1.172	82	60	1.367
11—15	133	102	170	72	61	1.180	66	36	1.833	97	73	1.329
6—10	132	163	130	73	59	1.237	102	61	1.672	65	65	1.00
0—5	205	173	135	118	87	1.356	113	60	1.883	66	69	0.956
其 他	3											
计	1458	1440	1761	771	684		804	636		950	811	

在表2中有几点变化特别明显。第一,老年人口显著增加。61岁以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1935年和1956年的6.4%增加到1981年的11.1%。71岁以上的老人数增长幅度更高,1981年的数字分别为1956年的2.1倍和1935年的4倍。

第二,15岁以下的人数有逐渐下降的趋势。1935年为470人,1956年降为438人,1981年是435人。如果将“文革”期间出生率受到影响的因素撇开,仅从0—5岁一组的人数来看,下降的速度很快,1981年比1956年下降了22%。第三,男女比率开始趋向平衡。男多女少是开弦弓村人口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1935年或1956年,中年以下的人口中,男性均大于女性。而1981年的资料表明,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总数上男多女少的现象仍然存在,但两个最小年龄组内的性比率已趋于平衡。0—5岁年龄组的性比率甚至低于100。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时间点的人口金字塔的不同形状中直观地看出上述的变化。并且将1981年的金字塔与前两者加以比较的话,就能反映出江村人口类型的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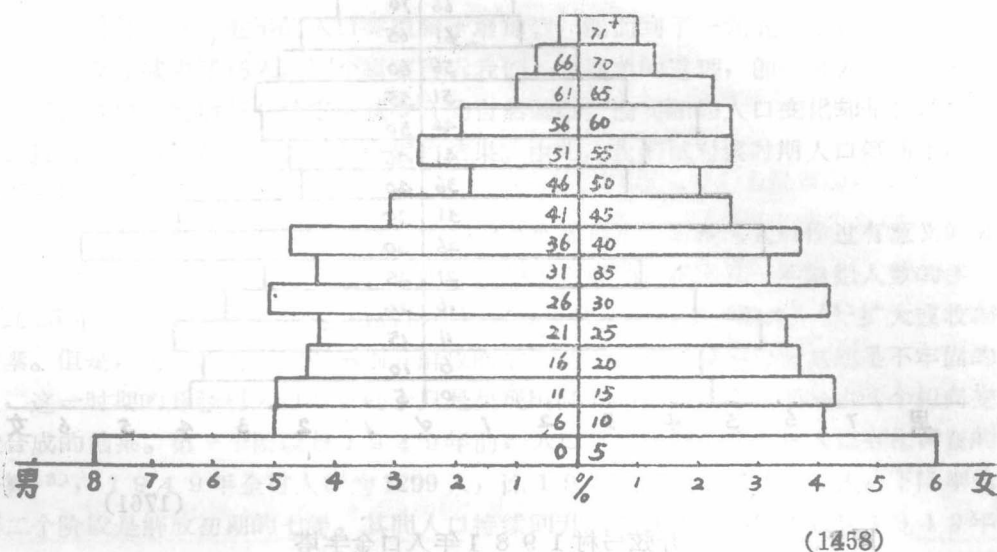


图1. 开弦弓村1985年人口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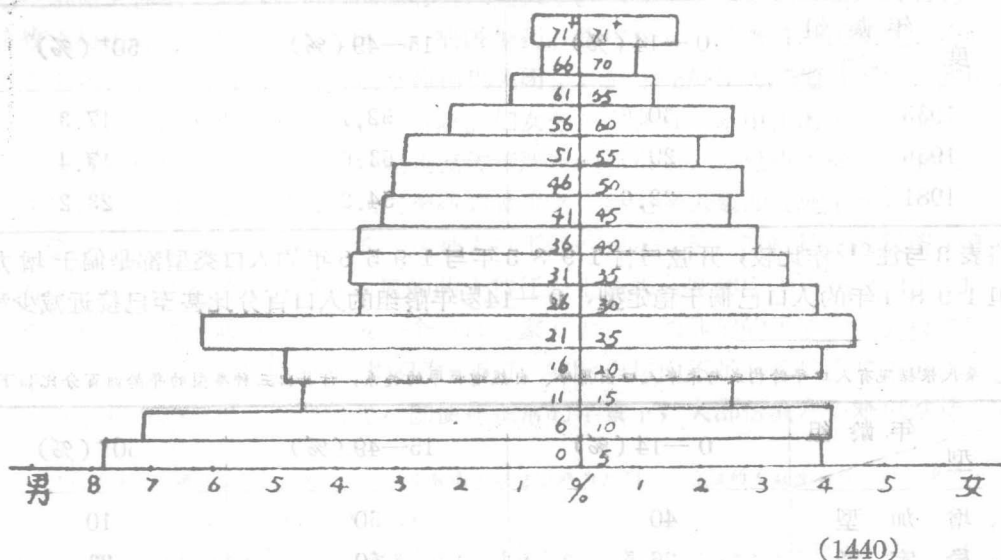


图2. 开弦弓村1956年人口金字塔



表 3. 1935年、1956年、1981年人口类型对比

将表3与注^{〔1〕}作比较,开弦弓村1935年与1956年的人口类型都是偏于增加型的。但1981年的人口已偏于稳定型,0—14岁年龄组的人口百分比甚至已接近减少型。

类 型 \ 年 龄 组	0—14 (%)	15—49 (%)	50+ (%)
一、增 加 型	40	50	10
二、稳 定 型	26.5	50	23
三、减 少 型	20	50	30

• 4 •

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人口数停滞下降的原因

开弦弓村一九三五年的人口类型属于增加型，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全村的人数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18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一种人口类型的确定只是提供了该人口可能增长（稳定或减少）的自然基础。而实际的人口变化却是自然基础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试对该时期人口停滞下降的原因作如下分析。

一九五六年格迪斯教授曾对这一被称为“高度稳定”时期的人口作过有意义的分析。他首先排除了可能出现的统计偏差。接着又以25年为周期，指出某一年龄组人数的多少，将反映到25年后提供人口的多少。虽然格迪斯教授也曾考虑到使“微波”^{〔1〕}扩大或收缩的其他因素。但是，我们认为他这种不划分解放前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析基础是不牢固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开弦弓人口并不处于只是呈现出微波的稳定状态，而是由两个相向变化的阶段合成的结果。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前，人口逐年下降。我们按人口变化调查的数据来推算^{〔2〕}，1949年全村人口为1299人，比1935年减少了159人，下降率为11%。第二个阶段是解放初期的七年，其间人口持续回升。1956年的人数比1949年增加了141人，增长率达11%。由此可见，所谓的人口稳定状态是以两个不稳态为变化过程的。

从第一个不稳态，即解放前的阶段来看，造成该村人口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治动荡，战争连年不断。自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十四年间有十二年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在与老年农民的谈话中得知，由于战争，这里曾发生过两次集体性逃难。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八、一三”事件后不久，为免遭日寇屠戮，村民们纷纷离开家园，避进太湖或远走他乡。当时整个村子几乎成了无人村。虽然在事后大多数人转回村子，但也有些人流失了。第二是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在费孝通教授初访时，开弦弓村没有医生，缺医少药。全村仅有一名来自浙江乌镇的药物商，经营着一个小药铺。抗战后期，则连这小药铺也关闭了。迫于经济压力和地域不便，农民生病一般不是去就医，而是求神、喊魂和拜菩萨。妇女分娩则在自己家中由老年妇女或接生婆接生，产妇与婴儿的死亡时有发生。当地还流传着严重的血吸虫、血丝虫等病症。卫生条件的低劣和疾病使该村的死亡率增高，死亡率高的表现之一则是老人数的比例很小。

第三是经济凋蔽，灾荒频繁。这是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江村地区的经济早在1935年前就已经开始衰落了。经济衰退的两大特征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传统丝绸业的破败。在1936年，费孝通教授曾假设一个三口之家（夫、妇和他们的子或女）需要5亩以上的土地^{〔3〕}。而当时全村耕地每户平均只有9.5亩。实际上村内不足9亩的农户占93.8%，仅有4亩或以下的占75.8%。由此可见，即使在正常的年景下，大部份农户仍难以维持全家最低限

〔1〕“微波”指较低年龄组的人数波动由较高（以25年为周期）年龄组的人数波动所引起。参见《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2〕此次调查中将全村自1949年至1981年逐年的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作了追查和统计，并以1956、1964、1981三个年份的数字为基准，推算出该村解放后各年的人口数。

〔3〕当时的亩产约为5蒲式耳（英制）相当于3斗6升，折合重量约相当于50市斤。亩产则在250市斤左右。而三口之家全年的口粮需27蒲式耳，即需1350市斤，

度人口的生活。此后，1938年、1940年和1949年开弦弓遭到了三次大水灾；1943年农作物又为蝗虫所害，致使这几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饥饿威胁着贫苦农民。于是他们不得不忍痛典出仅有的少量土地或借高利贷。因此，到解放前夕，全村70%以上的土地被居住在城镇的地主占有（在1936年地主占有土地为56.5%），农民每年要将总收成的40%以上用来缴纳地租。1938年以后，该地区传统的丝绸手工业也被日本侵略者彻底摧毁^{〔1〕}，农户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被切断了。日趋贫困的经济生活抑制了人口的增长。抑制的手段之一是溺婴。据我们调查，除了不能生育的和未婚的，村内的老年妇女在解放前都溺死过婴孩，最多的一位溺婴数是11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溺婴的性别选择是由两个方面的考虑来决定的：一方面每个农户必须有一个男孩，以免断了“香火”。这就使女婴受到更严厉的限制。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分“家”而使土地和房屋更分散，贫苦农民便不允许第一个以下的男孩生存下来。

由此可见，解放前开弦弓村人口的高出生率被传统的溺婴抵消了。人口的低寿命和其他年龄组的高死亡率是全村人口萎缩的直接途径。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当时各年份死亡率的数字，但它可以由表4和表5的比较中得到佐证。

表 4. 按1935年普查推算的应有人数与1956年普查实有人数比较

年 龄	男				女				总 计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
71+	40	10	30	75.0	38	10	28	73.2	78	20	58	74.4
66—70	26	9	17	65.4	29	13	16	55.2	55	22	33	60.0
61—65	45	17	28	62.2	38	18	20	52.6	83	35	48	57.8
56—60	69	31	38	55.1	55	37	18	32.7	124	68	56	45.2
51—55	64	42	22	34.4	45	30	15	33.3	109	72	37	33.9
46—50	75	44	31	41.3	61	40	21	34.4	136	84	52	38.2
41—45	63	47	16	25.4	52	36	16	30.8	115	83	32	27.8
36—40	68	54	14	20.6	54	43	11	20.4	122	97	25	20.5
31—35	72	56	16	22.2	61	50	11	18.0	133	106	27	20.3
26—30	73	52	21	28.8	59	57	2	3.4	132	109	23	17.5
21—25	118	90	28	23.7	87	74	13	14.9	205	164	41	20.0

〔1〕 日军侵占以后，开弦弓村内的合作丝厂被洗劫一空，邻近的震泽镇丝厂被夷为平地。

表 5. 按1956年普查推算的应有人数与1981年普查实有人数比较

	男				女				总 计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推算	实有	下降数	下降率(%)
71+	44	33	11	25.0	40	43	3	7.5	84	76	8	9.5
66—70	47	28	19	40.4	36	25	11	30.6	83	53	30	36.1
61—65	54	29	25	46.3	43	37	6	14.0	97	66	31	32.0
56—60	56	44	12	21.4	50	43	7	14.0	106	87	19	17.9
51—55	52	58	-6	-11.5	57	49	8	14.0	109	107	2	1.8
46—50	90	78	12	13.3	74	48	26	35.1	164	126	38	23.2*
41—45	68	63	5	7.4	58	38	20	34.5	126	101	25	19.8*
36—40	66	58	8	12.1	36	36	0	0	102	94	8	7.8*
31—35	102	88	14	13.7	61	74	-13	-21.3	163	162	1	0.6
26—30	113	100	13	11.5	60	102	-42	-70.0	173	202	-29	-16.8*

表 4 中各年龄组（无论男女）的下降人数一般都大于表 5 中的下降数^[1]。其下降率是惊人的。而据我们调查，在解放初期的七年内，开弦弓村的人口死亡率只有一年是14%，其余都在10%以下；该时期人口的流动是均衡的（迁出数约等于迁入数）。因此，如此高的下降率主要是在解放前一段时期内实现的。

三、解放后人口的自然增长

一般说来，解放以后开弦弓村人口变化是持续增长的。为了探求其间的细节和变化的特点，我们追查了逐年的出生和死亡人数（表 6）。并以推算出的各年份人口为基数，分别计算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图 4），最后获得了全村三十三年来的自然增长率曲线（图 5）。

表 6. 1949~1981 全村出生与死亡人数

年份	出生数	死亡数	年份	出生数	死亡数	年份	出生数	死亡数
49	31	12	60	11	31	71	32	9
50	19	8	61	10	33	72	29	9
51	41	16	62	33	23	73	41	10
52	38	12	63	46	7	74	20	7
53	27	6	64	34	9	75	18	8
54	44	10	65	29	9	76	21	17
55	27	13	66	35	12	77	24	14
56	28	7	67	30	11	78	30	18
57	31	14	68	29	8	79	16	12
58	15	20	69	38	10	80	22	7
59	19	18	70	47	8	81	22	10

[1] 表 5 中打* 的四个年龄组出现的异常情况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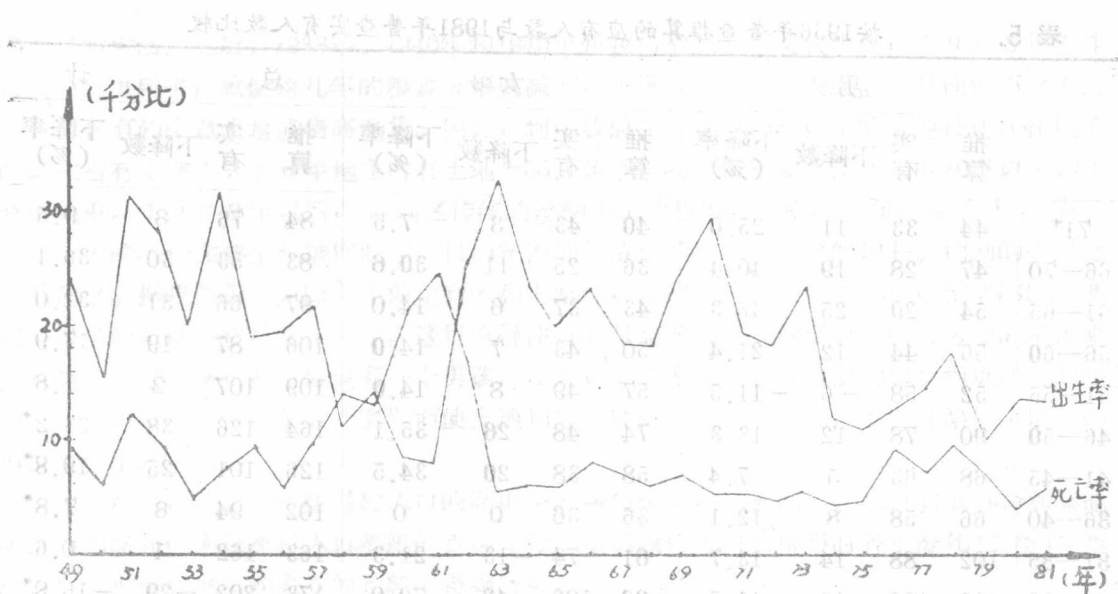


图4. 出生率与死亡率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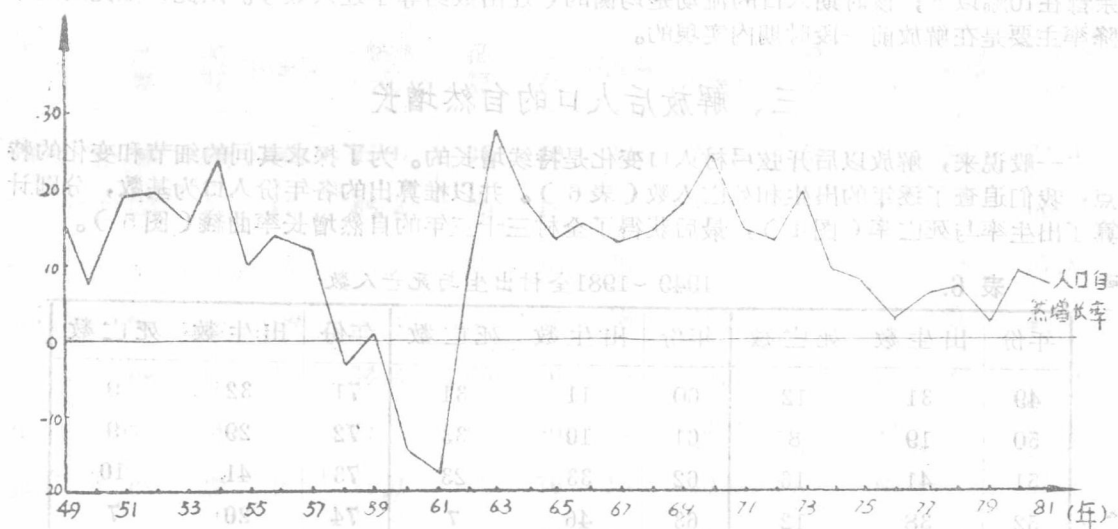


图5. 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

从图4和图5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该村的人口增长曾出现三个高峰。而这三次人口出生与增长的高潮所处的时期分别为1949~1957、1963~1966、1968~1974，其中后两次高潮几乎是连续的。这说明在全国范围的人口暴涨时期，开弦弓村并没有例外。然而它的增长速率却低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数，全村自然增长率超过20‰的只有54年、63年和70年。如果我们把表6中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波动拉平，则该村平均每年有28.4人出生，有12.7人死亡，两者消减以后年均增加人数为15.7，即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1%。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开弦弓人口平稳增长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来逐一加以分析。第一阶段是解放初期的八年，新中国的诞生使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使濒于潦倒的贫苦农户获得了土地。农作物的产量也年年增加，亩产由1950年的300斤上下一跃为1956年的600斤以上。土地的占有和生活的安定给农民以心理上的满足，充足的粮食更加强了这种乐观气氛，并使生养较多孩子成为可能。于是人口生产力也被解放了，8年内共生养了255个孩子，相当于1949年总人数的 $\frac{1}{5}$ 。其中生育数最多的1954年，出生率高达31.3%。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家人家中兄弟或姐妹超过二个的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出生的。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人口恢复期。第二个阶段是人口的失落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1958年秋季以后就出现了困难局面，一直延续到1962年。五年内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尤其是60、62两年的死亡率是23%与25%。相应的情况是出生率下降，上述两年的数字分别为7.9%与7.5%。除此以外，一部份青壮年妇女还外出觅生，据我们统计，流落到浙江不再回返的妇女人数是23名^{〔1〕}。经过几年的困难时期，该村人口总数据推算为1333人。由此可见，“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在农村有着其实际的内容。第三阶段是从1963年到1966年。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错误，农业发展的正确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自1964年起还开始注意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倡计划生育（包括晚婚措施）。因此，这一时期是人口有节制增长期。虽然该村1963年是解放后人口出生率最高的一年（32.8%），但随后的几年出生率都在20%左右。第四个阶段是十年内乱的中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济收入愈来愈低，吃“大锅饭”的思想越搞越浓。加上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经济政策之间发生矛盾，工作也十分混乱。于是乱中生孩子，该村又出现了一些第三胎或第四胎的孩子。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期。第五阶段是人口的平稳发展期。自1974年开始，该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事务被排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大批育龄妇女进入社队企业当工人，更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因此，该村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般保持在15%左右，自然增长率则徘徊在5%上下。

上述过程还不能说明开弦弓村人口增长为何平稳的问题。但它给了我们一条线索，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初步触到了以下几个因素：

1. 溺 婴

溺婴在解放前是很普遍的现象。只要一个家庭不准备接纳新成员，那么刚分娩的婴儿就被丢入便桶或水盆，开弦弓人称之为“闷死”。解放以后，溺婴虽然受到禁止，但溺婴现象并没有马上消失。据我们调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溺婴数分别占出生数的22.7%和31.4%（见表7）。到了七十年代，溺婴数显著减少。我们调查到的最后一个被溺死的时间

表 7. 开 弦 弓 村 溺 婴 情 况

年 代	出 生 数 (包括溺婴数)	溺 婴 数	溺 婴 比 例 (%)
五 十	374	85	22.7
六 十	223	70	31.4
七 十	290	12	4.1

〔1〕这一数字仅指当时已婚离乡而造成夫妻离异的，不包括未婚妇女。

是在1975年，此后便没有查到有溺婴现象发生。

表7中的溺婴数绝大部分发生在1964年以前，1970年代的溺婴则都是在避孕失败、而对人工流产又不放心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事实表明，在没有科学的避孕方法或节制生育的措施未被接纳之前，开弦弓的农民没有放弃或者说是不得不采取传统的习惯手段来控制人口。

我们说旧社会的溺婴体现了农民对土地分散的耽心和经济的贫困。而新社会控制人口的观念来自于为儿女创造新生活的现实考虑。一对拥有二个男孩，住在一间半旧式房舍内的青年夫妇是这样盘计他们的未来的：在孩子尚未成为劳动力之前的十二年内，以每年积余200元计，刚好能盖上一个儿子结婚时所需的住房。在孩子成婚前的五~六年间，必须攒下2千元左右的现金，其中大部分为一个儿子娶亲，一小部分为另一个儿子的“嫁出”（被招女婿）花费。由此可见，近二十年的辛劳只能解决一个儿子的婚配。这不能不使江村农民自发地维持控制人口的习惯。

2. 育龄妇女少

男多女少是开弦弓人口的一大特点，其中育龄妇女更少。1956年16~50岁的妇女人数为358人，到1964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327人。1981年育龄妇女人数虽然达到417人，比1964年增加了90名。但其中约 $\frac{1}{6}$ 以上是由非本村人婚入的，而且大都是在76年以后嫁到村上来的。就本村出生的育龄妇女来说，1978年到1981年，三年内只增加10人，增长率远远低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自然，一个村庄的人口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如果有适量的女性人口流入开弦弓，那么原先男多女少的人口也不致于影响到育龄妇女数。但是在开弦弓周围的村子里也并不存在过剩的女性人口，况且开弦弓村的经济状况在整个苏州地区属于中下层。这就使村内困难户的男青年或丧偶、离异的壮年男子无力娶妻和再续。1981年该村自20岁至55岁男子的在婚率只有69%。

由于上述两个主要原因的影响，加上女子初婚年龄提高（约3岁）、已婚妇女节育率提高等其他因素，使开弦弓人口自然增长显现出平稳上升的特点。

四、人口的迁移

人口迁移通指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变更。鉴于这一概念太广泛，我们首先将人口迁移分为长期性迁移和短期性迁移二种。所谓长期性迁移。是指时间在一年以上的移到另一固定地点的人口流动。短期性迁移则指离开日常生活区域、时间短暂且地点并不固定的人口流动。

解放前开弦弓村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因此除了婚出、婚入和外出做工以外，几乎不存在人口的长期性迁移问题。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料，我们求助于村内的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的长期性迁移规模较大的只有两次，即抗战以前全村约有二十名妇女到苏州和无锡的丝厂去当工人。抗战爆发后这些人全都转回到村里。日寇投降以后又有二十余名妇女去苏州丝厂做工，解放后她们陆续退休回村。

虽然长期性人口的人数不多，但解放前的短期性迁移却是大量的。利用航船跑长途贩运，是短期性迁移的一种最主要形式。1937年以前，不少农户利用秋收之前的农闲季节从事此项活动。当时全村约有船只一百六十余条，每条船一般为2人。这些船只的一半左右就

近将浙江湖州一带的青菜等物运往自己村庄附近的集镇出售，来回需化十天时间，一般一次闲季贩运二、三次。另有四分之一的船只跑得稍远些，将浙江乍浦等地的海货（如海蜇等物）运销到苏州、无锡。如此往返一次约半个月，因此一次闲季只能跑两趟。另外，少数本钱较足、运销经验丰富的人则远往天目山区贩运杉木、毛竹等建筑物资。由此估算，当时开弦弓村每年有250人离开村子一个月。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战乱，长途贩运受到水上交通安全和销售清淡的双重限制，临时性的人口流动较之战前减少。

解放以后，该村永久性的人口迁移率可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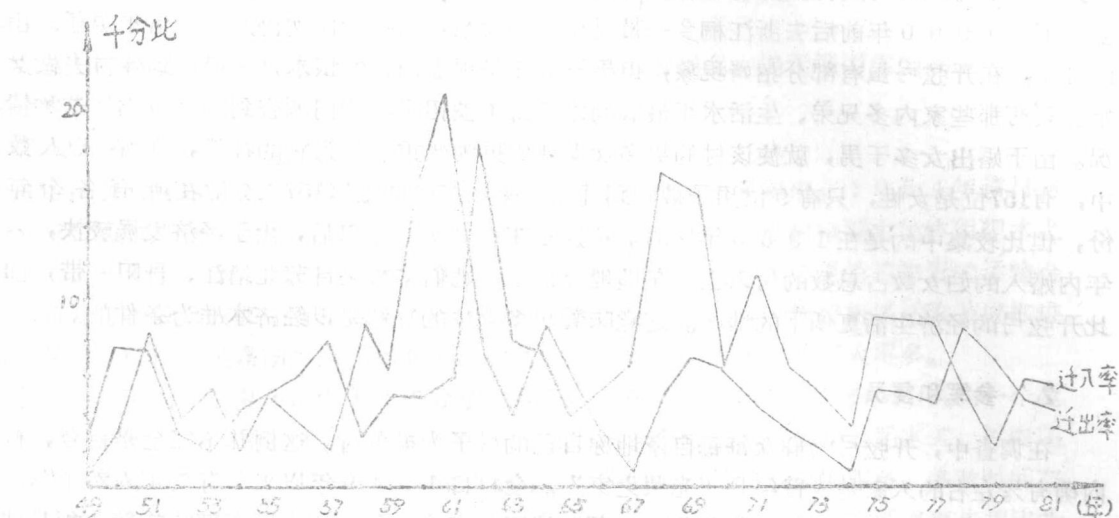


图6. 1949~1981年人口永久性迁移率

从图6中可以看到开弦弓村的人口迁移总量很少。除极少数几个年份外，该村的迁入率和迁出率都低于10%。如果按净迁移率（净迁移率等于迁入率减去迁出率）来统计，那就如同表8所示，其起伏的幅度更小。因此，一般说来人口的长期性迁移对该村人口变化的影响

表8. 解放后人口净迁移率(%)

年份	净迁移率	年份	净迁移率	年份	净迁移率	年份	净迁移率
1949	2.3	1957	6.3	1965	-2.1	1973	3.0
50	4.6	58	-5.7	66	2.0	74	1.8
51	-0.8	59	-1.4	67	6.7	75	2.9
52	-0.7	60	-10.2	68	12.4	76	3.0
53	-3.6	61	-15.0	69	8.9	77	4.1
54	2.2	62	9.6	70	0	78	-4.0
55	0	63	4.2	71	7.3	79	-4.1
56	2.7	64	-1.4	72	3.0	80	0.6
						81	1.1

甚微。同时，图6还显示出人口的迁入率略高于迁出率，而影响迁移率曲线的主要因素是婚嫁，所以迁入大于迁出的现象是该村男多女少以及女子村内婚现象严重的必然结果。

开弦弓村人口永久性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婚出和婚入

因婚配或婚姻离异而发生的迁移是永久性迁移中人数最多的一种形式。三十三年内迁出和迁入总人次分别为281与327(不包括该村内部队与队之间的迁移，下同)。而婚出与婚入的人数是97与166，分别占总人次的34.5%、50.8%。在婚出人数中，女性的比重为91.8%。即使不计1960年前后去浙江桐乡一带觅生的妇女数，女性的比例仍然是六倍于男子。由此可见，在开弦弓虽有部分招婿现象，但男子仍然是顶立门户的根本，一般不到外村去做女婿。只有那些家内多兄弟、生活水平最低的才不得不得被招亲，我们调查到的8位均属这种情况。由于婚出女多于男，就使该村的男多女少现象更为严重。作为它的补偿，在婚入人数中，有157位是女性，只有9位男子被招到开弦弓来。在时间上这157人分散在所有各个年份，但比较集中的是在1963年以后。特别是在1976年以后，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六年内婚入的妇女数占总数的1/4以上。在地理分布上，她们多数来自苏北靖江、丹阳一带，即比开弦弓的经济生活更低下的地区。这意味着男多女少的补偿是以经济水准为条件的。

2. 参军和复员

在调查中，开弦弓的群众每每自豪地称自己的村子为模范村。这倒并不完全是自夸，村内确有1/5左右的人家是或曾经是“光荣之家”。全村自1949年以来共有74人参加了军。其中的66人经过三至五年的部队生活又都陆续回到家乡。其余的则留在部队或转业到其他地区。在开弦弓，复员军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中的多数人现正担负着大队、生产队和队办工厂的领导职务。

3. 送养和领养

这里所说的送养和领养并不是那种将一个人部份地归于另一亲属体系中的所谓认“过房”的继养方式。而是从小(一般是婴幼儿)完全转移亲属关系的送出和收领。例如费孝通教授曾在江村经济中提到的“童养媳”就属于领养的一种形式。为了避免或割断婴幼儿原先的亲属关系，无论是送养或领养，一般都不在村子内部。解放后开弦弓村送往村外的数字是38名，其中男孩20名。收领其他地区的儿童为28名，其中女孩为16名。让我们先来看领养，它是否仍然带有如同费教授所说的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完婚时的手续费而为之的那种意义呢？从调查材料来看，领养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在解放初期的领养中，除个别无后嗣的外，大多数领养者的家中都有一个与被领养者年龄相仿的异性儿童。而且现在确有六对成为夫妇。一个已生育一双儿女的年轻妇女告诉我们，她少年时就已经知道她父母领来的“哥哥”是自己将来的男人。因此确认解放初期的领养属于找小媳妇或配小丈夫之例恐怕是没有疑议的。但是虽然有成为夫妇的事实，也不能不看到更多的“预备夫妇”长大以后各自另择佳偶的事实。家长们的热切希望落空了，于是得不了一面替亲生儿女结亲，一面为领养的子女完婚。这种失算是时代的进步造就的，领养也就愈来愈少，自1976年以后只领进一个女孩。领养的目的趋向单一方向，即为了排解晚年的孤寂。

4. 插队与上调

这是十年内乱期间的一种强制性的人口流动。从1968年始,这里先后有28名(男16、女12)苏州、吴江县城以及周围集镇的知识青年。到1980年,除了在村内的一所初级小学还有一名女青年,其余的都通过各种途径上调回城了。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他们带来了麻烦。当然这种麻烦主要不是这些青年自身的事情。费老在四访时曾谈到吴江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学士,但一有学问,出了名便不是吴江的人了。在农村无需要科学,知识分子耻于从事农业的时代确是如此。在今天,我们相信,科学将成为一条链子把城和乡这两个极点联结起来。

除以上四种形式的人口流动,还有工人下放、退休以及招工、提干等因素引起的迁移,但数量很少。

解放后开弦弓村人口短期性迁移大至有以下一些:

贩运:解放前的长途贩运在解放初期的和平环境下又再度频繁起来。1954年该村是80%左右的船只参与贩运。1956年以后贩运逐步减少。六十年代中期由集体组织水上运输。1981年,该村有一个近十人的运输队,承包黄沙、石子、毛竹等物资的运输合同。他们只有在节日或家中有重大事务时才回家。大部分时间驾着用拖拉机马达改装成推进器的水泥船,航行在杭嘉湖平原的水面上,活动的范围自然比摇橹的木船大得多。

零工:零工的种类得多,但主要成分是建筑工。该村既有集体经营的约三十人的一个建筑工程队,常年上海等地修建民房、校舍。又有十几个个体或二人合作的泥木工。村内还有少数人从事理发、照相、修理钟表、缝纫等行当。他们大都是半专业性服务,多数时间在村内,只是定期性或偶而外出到其他村子。如欲取得生产队的集体分配,就要将事先规定的金额上交集体,其余归己。我们访问到一位白铁工,家里一共三人:本人妻子和还在念小学的女儿。可能当年的生意还算兴隆,他比较乐观,说将比参加田间劳动要多收入200元左右。

出差、学习:

目前该村有两家队办工厂和一个公社缫丝厂。因此对在社队工厂务工的社员来说,增加了一个新的流动项目:出差和学习。据介绍,凡是进丝织厂和缫丝厂的新职工,一般都要外出学习。时间有一个月、三个月或半年不等。地点近则就在本公社所在地的庙港镇,远则到盛泽、苏州或上海。同时,这些社队工厂也为其他地区的队办企业培训新职工,1980年就有南通地区一家工厂的十余名工人来开弦弓达三月之久。出差、学习和办社队工厂对开门见河、出门摇橹的开弦弓来说无异是从封闭走向开放。至于它对这一小社区的影响将是继续研究的一个课题。

关于人口迁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村内婚嫁引起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人口漂移。开弦弓村有十五个生产队。除了河道相隔,队与队之间房屋挨挤、巷路相连。因此村内婚只是改变了新郎、新娘的住所而已。然而这种改变住所的人数是很可观的。队与队之间的迁出、迁入总数是332人。不论男女,村内婚的人数都高于村外婚人数。如嫁到村外的姑娘三十三年来计有47人,而嫁在本村的有168人,超出近三倍。由于村子较大,这些年来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村内婚对人口质量的影响。但如果长期信奉村内流传的那句“好男好女不出村”的话,血缘将越来越近。那么过不了多久,话中的两个好字就会大打折扣。

五、人口质量变化与计划生育

1. 人口质量变化和问题

衡量人口质量的优劣有不少指标。我们择其要者考察其中的两项，即从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两个方面作粗浅的分析。

就健康状况而言，群众普遍反映要比解放前好得多。他们列举出一些对比性的例子。如旧社会老人在六十岁不到就死亡的不在少数，七十岁以上的真是古来稀。而现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仅数量多，而且还都在强健地参加田间劳动或照看孙辈儿童。现在八十岁以上的人数与三十年代七十岁以上的人数大体相当。1981年年龄最高的一位老太太已是93岁了。又如解放前村内的产妇因难产母子同时死亡的事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而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件。再如过去村内患血吸虫、血丝虫症的患者为数不少，而现在经多次普查案例极为罕见。因此这里的兵源充足。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用死亡率降低这根曲线将它们概括地显示出来（参见前文图4）。从死亡率曲线上看可以看到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59、60、61三年的特殊情况以及78年该村发生了一次翻船事故外，死亡率的趋势是逐步降低的。1968年后则基本稳定在5%的水平上。这无论是从该地区的平均水准（全县约7%左右），还是从该村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2.75岁（1981年）的人口类型本身来说，都是属于低死亡率。与人口死亡率相应的一个指标是入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虽然开弦弓村的死亡数远远不够编制寿命表的需要量，但我们将一段时间的资料汇集起来，计算分年龄组的简表。由此得到了该村1981年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这一数值的统计准确度固然不高，但它足以说明开弦弓人的生命里程的扩展。旧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因此即使存在统计误差，这两个数值之间还是无法比拟的。

死亡率降低和预期寿命提高是以物质生活和医疗卫生的条件改善为基础的。虽然该村的经济还不富裕，人们日常的菜谱上多为蔬菜类，荤菜较少且又多限于鲜鱼和鲞。但是在粮食上已基本得到满足，正如费老在“三访江村”一文中所说的处于温饱状态。我们列出下表（表9）作为温饱状态的注脚。

表 9. 1980年与1935年食粮对照 (斤)

人 口 状 况	1980年	1935年 ⁽¹⁾
50岁以上男子	585以上	450
40岁以上妇女	585以上	375
成年男子	750~800	600
成年妇女	650~700	450
10岁以下儿童	400左右	225

表9反映出1935年各类人口的食粮只有1981年的75%或65%。由此可见，由饥饿到温饱确是前进了一大步。

[1] 1935年各类人的食粮依次为9、7½、12、9、4½，单位是浦式耳。表9中数字系依照每一浦式耳粮食折合成50市斤计算所得。

村内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更为显著。现在村里有两个合作医疗站。社员们全都参加了合作医疗，每人每年只需交1元5角，就可以享受合作医疗站的免费治疗。如果须出外就医，全年还能报销30元的医疗费。倘若医药费超过30元，则超出的那一部分还能报销一半。所以合作医疗不仅能方便群众治病，而且还相当于一项最廉价的医疗保险事业而受到社员的欢迎。住在开弦弓村东头的一位青年男子，在1981年夏季因挑担上船不慎摔倒，伤得比较严重。住院治疗花了几百多元。除医疗费按规定报销外，大队还补助了一笔钱。他本人半年未能下地，他的妻子为照料他也误了不少工，但由于医疗费用大部份不必自己承担，加上一年出栏了五口肥猪。他算下来能做到基本上不亏空。他赞美他那贤慧的妻子，他更感激党的关怀和集体的照顾。他只用了半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如果在旧社会我是怨也想不出。（即无法想象这件事的后果）

合作医疗站的四名赤脚医生都在县人民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受过一定的训练。经过几年的实践，他们已成长为医疗上的多面手，不仅要治各科的常见病，还要为产妇接生，同时还兼做防疫、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虽然他们的医疗水平还有待于提高，而且存在着报酬偏低、不能兼营家庭副业和家务等实际问题，但他们工作仍十分勤勉。平时走门串户送医上门；定期为儿童注射防疫针（近十年未出现过麻疹、破伤风等病症）；病员发病时随叫随到，有时还护送病人去医院就医。由于他们的工作，提高了人口的身体素质。他们也就成为社员群众最受欢迎的人。

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也有了进步。例如1956年格迪斯教授所见到的普遍在河内刷马桶的现象有了改进。虽仍有少数为图省事在河边操作，但邻里们认为这很不卫生。有的家庭已食用井水，饮用河水的也大多经过药品或明矾沉净。

就文化程度而言，解放前后的对照也是鲜明的。我们将1948年和1981年的资料加以比较。1948年，全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有1人，有初小或初小以上的也只有150人，当时该村的文盲率约为88%。1981年，全村有高中生46人，具有初中学历的是206人，高小毕业的有179人，初小文化程度的为436人。在人数上是解放前的5.7倍。1981年的文盲率是33%，比1948年降低了55%。而且现在人口中的文盲数有70%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在开弦弓村15岁以下的学龄人口中，入学率为100%。

尽管人口的文化素质要比旧社会时好得多。但无庸讳言，开弦弓人的文化程度是低的。不仅落后于城镇，而且落后于同地区的其他村庄。在194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产生了177个新文盲，占15~41岁总人数的24%，即解放后成为学龄儿童的人中（不包括现在的学龄人口），每4人中有1人是文盲。这是该村人口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地处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的村子出现如此多的新文盲？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扫除文盲？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在对此作出科学回答之前，从人口研究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应当限制进入劳动队伍的人口年龄（包括家庭副业劳动）和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则应通过各种途径向农村输送生产和生活的科学知识，村内可开辟文化活动区域，让那些好学、求上进的青年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科学化的进程中有用武之地。并逐步改变劳动报酬单纯以体力为标准的状况。前者是消极的一面，后者则是积极的一面。总之，要使开弦弓在经济建设方面走向前列，就不能不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势将拖住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后脚。